

陈山著

中国 武侠史

上海三联书店

为了真正认识中华文化这一独特的系统，除了宏观的理论研究之外，目前尤需脚踏实地的实证研



究。只有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中深入考察与思考，中华文化的研究才会有新的突破。

中华本土文化

中华本土文化丛书

陈山著

中国武侠史

上海三联书店

(沪)新登字117号

责任编辑 杨晓敏
封面设计 陆震伟

中国武侠史

陈 山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125 插页：3 字数：200000
印数：1—5000

ISBN 7-5426-0560-7/G·94

定价：10.50元

编者序言

上海三联书店策划编辑的中华本土文化丛书，在1990年推出第一辑，颇受学术界注意。这套丛书，作为本店的重点出书项目，将每年推出一辑，力求反映这一领域研究前沿的学术成果。

在中华本土上滋生的中华文化，延续古今，传播中外，其时空的博大精深，居世界前列，是我们民族的根基。上海三联书店初创之时，恰逢国门顿开，西方思潮汹涌而入，引发学人对民族文化的又一次反思，并反弹起一股对中华文化的研究热潮。正是在这历史背景底下，我们审时度势，生发出组织出版本丛书的使命感。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伸张我们对中华文化研究的基本观念。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其精华与糟粕，而任何民族向现代化奋进，都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根基。我们不赞成把中国百年来的积弱完全归因于文化因素的文化宿命论观点，我们也不赞成重新把儒家捧上至高无上的宝座这样的复古倾向。我们以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都是不科学的，都不能解决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作为中国人，我们只能面对我们文化的传统和现实，寻求现代化的道路。在考察对中华文化的研究状况时，我们还感到，以往学

FG86/21380-67

术界对传统的上层精英文化给予较多的瞩目，相对来说，对于下层的民间文化，缺乏高水准的研究。所以，作为中华本土文化丛书的组织者，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不同于当时流行的许多纯理性探讨的文化学术著作，而提倡脚踏实地、深入探求的研究作风，以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田野考察和标本剖析，揭示中华大地上的诸文化相，并着力透过中国历史的和现存的种种文化表象，探索其深层的内涵和意义，对中华文化做出自己的解说，进而以开放式的现代学术意识，构建当代中国的新型文化体系。我们还希望这套丛书的写作，能够朴实自然，而不去追赶时髦。要求资料充实，准确可信，语言规范，简洁通达，深入浅出，生动明畅，使严谨深刻的学术研究成果，能为更多的读者所受益。

中华本土广袤磅礴，文化含蕴深沉丰厚，对它的研究永久不能穷尽，故而中华本土文化丛书的出版，将是上海三联书店的长期事业。我们热忱希望得到学术界朋友们的支持，希望有更多的优秀研究成果加入本丛书的行列。

引 子

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走向 21 世纪的转折关头，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把握，成为无可回避的重要课题。然而，在研究中人们往往容易陷入思维方法上的误区：或者将传统文化视为铁板一块，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部保留，忘却了对之进行结构性分析；或者把传统文化等同于我国古代社会的上层文化，忽视了作为中国文化根基的下层社会的民间文化，——如此，对于传统文化的把握势必是不完整的，研究也难以深入。

为了走出误区，全面而又深入地探究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必须找到解剖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结构的主要解理线。徐复观曾提出中国文化的“层级性”结构问题。他认为“层级性”，是指同一文化所呈现的许多不同的横断面。^[1]余英时则认为，中国文化的这种层级性结构的主要分野，恰好在他称之为“大传统”、“小传统”的上层知识阶级的精英文化与下层平民的大众文化间。^[2]有些研究者也在自己的具体研究中，“深深感到‘上位层次文化’即官僚——士大夫文化与‘下位层次文化’即俗文化的差异”^[3]。

[1] 徐复观：《中国文化的层级性》，载《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73 页。

[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9—139 页。

[3] 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 页。此外，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参见《乡土中国》，三联书店 1985 年版，第 1 页。

上述研究成果不约而同地证实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结构的主要解理线正在于中国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接合部。由此作为切入点，我们便可以剖析出中国传统文化大系统中两个相反相成的文化子系统。这两个文化子系统的结构成份，正如徐复观所说：“表现有很大的距离；在很大的距离中，有的是背反的性质，有的又带着很微妙的贯通关系”^[1]，因而是两种互相渗透的异质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主要的文化子系统各有其主要的文化载体。闻一多当年曾称引英人威尔斯所著《人类的命运》中的一个观点：“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据闻一多解释，威尔斯所指的“土匪”，包含有中国武侠的意思^[2]。而道家，不过是对于儒家的一个补充。近年来，有人提出“墨侠精神作为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精神相对立”的观点^[3]。现代作家沈从文则认为，在民间社会中，“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4]。那么，在上、下层文化中，儒与侠当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两个主要载体。

侠与儒一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阶层，它们同时出现于中国的先秦时代，并一直存在到近代。侠与儒的文化精神都带有某种“超越意义”，产生着广泛而持久的心理影响，并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中都隐隐约约地深藏着儒的影子，那么，中国民间社会平

[1] 徐复观：《中国文化的层级性》，载《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3页。

[2] 闻一多：《关于儒·道·匪》，载《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69、471、472页。

[3] 张未民：《侠与中国文化的民间精神》，载《文艺争鸣》1988年第4期。

[4] 沈从文：《湘西·凤凰》，载《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页。

民百姓的内心深处则忽隐忽显地闪动着侠的影子。因此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武侠现象，对于深入探究作为中国文化基座的民间文化的根柢，从而全面地理解把握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史学家们对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倾注了过多的热情，著述汗牛充栋，而对于武侠一类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并深刻影响中国大众文化的独特的社会群体却一直颇为冷落。中国的正史自东汉以后就不再有关于武侠的正式记载，给中国的武侠史留下了长长的空白。这本小书致力于弥补这一缺憾，通过对有关中国武侠的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力图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中国历史上——而不是武侠小说中——实际存在过的武侠现象，并通过勾勒这一民间武士阶层诞生、发展和流变的历史轨迹，从或一侧面揭示中国文化精神的自我塑造过程，探索中国民间社会大众文化的源流及其独特的形态。



作者简介

陈山，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年又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长期从事文化史与文艺史研究，有专著《痛苦的智慧——文化学说的发展轨迹》及学术论文多篇。

目 录

编者序言

引 子..... 1

一 早熟的幼儿：先秦的游侠

（一）执剑之族——远古的尚武习俗与侠的萌芽 1

（二）“国士”和“游士”——侠的初始形态14

（三）在群雄并峙的历史机遇中成长

——战国游侠的活跃28

二 出鞘的利剑：两汉的豪侠

（一）“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侠的豪强化47

（二）“贵交尚信，轻命重气”：任侠意识的自觉69

（三）“放纵末流，以武犯禁”：两汉皇权

对豪侠势力的摧残78

三 绵延不绝的流风遗俗：魏晋六朝与隋唐的侠风

（一）魏晋六朝侠的形态.....102

（二）隋唐侠风的分流.....121

（三）魏晋六朝与隋唐的咏侠诗潮.....135

四 侠的世俗化：宋以后的义侠

- (一) 两宋近代侠的出现·····159
- (二) 武林的侠节·····177
- (三) 绿林的侠气·····194
- (四) 秘密社会的侠迹·····212

五 侠的评估：对有关历史典籍的一个回顾

- (一) 诸子时期·····227
- (二) 史家时期及其他·····234

六 佩剑的“民间神”：武侠小说中的剑侠

- (一) 侠风的推崇与文言武侠小说的产生·····246
- (二) 近现代武侠小说和中国大众文化·····257

七 侠与中国文化精神

- (一) 中国文化精神中的侠义传统·····271
- (二) 侠士·武士·骑士·····297

一 早熟的幼儿：

先秦的游侠

(一) 执剑之族——远古的 尚武习俗与侠的萌芽

武侠的存在，是中国特有的历史与文化现象。它的出现，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与心理的因素。我们先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其形成的原因和初始面貌。

1. 远古尚武习俗的流传

我们的远祖曾是个十分强悍好勇的民族。考古学家们发现，旧石器时代的中国山顶洞人以及较晚的黄河流域人常在尸身周围撒上红色颜料——一种朱砂或赤铁矿粉^[1]。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出土陶器的花纹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白陶的血红线条，夹于两条平行线中。红色是鲜血和生命活力的象征。原始中国人对红色的偏爱，是我们远祖强悍的种族根性的体现。

[1] 转引自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东北沈阳的新乐文化遗址曾发现新石器时期的鹏鸟图腾；西南各族“至今还不同程度地保留其原始氏羌的虎图腾遗迹”^[1]；而活跃于中原各地的原始部族曾有着悠久的“歃血”习俗^[2]。这些现象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我们民族勇武强壮的根性，正如后来梁启超所说：“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3]。

除了种族的根性，我们远祖强悍的民族特质还由当时艰难的生存环境所致。可以设想，分散活动于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华夏诸族，在极其原始的生活条件中，需要怎样一种强壮的体魄和顽强的生存意志。据记载，“古者禽兽多而人少”^[4]，我们的远祖经常遭受猛兽野兽的袭击。所谓“鸷鸟攫老弱，猛兽食颀民”^[5]，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适者生存，有着强壮体魄的人生存了下来，他们不得不诉诸武力，“以伐木杀禽兽”^[6]。

上古时期部落间频繁的争战也是我们远祖形成强悍的民族特质的一个因素。恩格斯曾指出：“同氏族必须相互援助、保护，特别是在受到外族人伤害时，要帮助复仇。……因而，从氏族的血族关系中便产生了那为易洛魁人所绝对承认的血族复仇的义务。”^[7]这种血族复仇的原始意识往往酿成部落间一些大规模的械斗。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8]；刑天与帝争而“操

[1] 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页。

[2] 《淮南子·齐俗》：“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也，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

[3]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自叙》，载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第6册，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7页。

[4] 《庄子·盗跖》。

[5] 《韩非子·五蠹》。

[6] 《商君书·画策》。

[7]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8] 《淮南子·天文》。

于戚以舞”^[1]，这些上古“英雄时代”^[2]的传说，都是部落或部落联盟间流血冲突的变形记载。规模最大的是炎、黄部落联盟间的阪泉之战和黄帝、蚩尤部落联盟间的涿鹿之战，这两仗都打得“血流飘杵”^[3]。动荡不宁的生活和频繁激烈的战争造就了强悍好勇的民族性格。《易》经中“屯如，邰如，乘马班如”的爻辞^[4]描绘了我们远祖的习性。部落中一些体魄雄伟、气力过人、轻命勇武的人往往为其他成员所推崇所信服，从而成为首领。史籍载黄帝好“内行刀锯，外用甲兵”^[5]；并传说蚩尤“铜头铁额”^[6]，就是说出入常戴着战盔，给人以一种赳赳武夫的感觉。

数以万年计的漫长的史前时代形成了中国初民独特的生活方式。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习武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那个时候，农耕和习武大概是一般百姓最主要的生活内容了。在人们聚居的乡间，平时大家在“春蒐夏苗，秋猕冬狩”的间隙演习武事。据《周礼·大司马》记载，在春天，军事长官挥舞旗帜召集乡民，在田野练习布阵和战法，了解击鼓鸣金等军事号令的含义；到了夏季，乡民们刈草宿营野外，还进行夜战训练，并识别军事标志；秋天时，乡民们练习出兵行军，辨明军队中各种旗物的用途；入冬后，进行全面的检阅，且进行大规模的实战演习。像这样的举动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地进行，久而久之

[1] 《山海经·海外西经》。

[2] 意大利17世纪的著名学者维柯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神的时代”(神话时期)、“英雄时代”(英雄传说时期)、“人的时代”(古史时期)。参见《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3] 《贾谊新书·益壤》。

[4] 《易·屯》“六二”。

[5] 《商君书·画策》。

[6] 《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龙鱼河图》。

便成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习惯。每隔三年，则举行更大规模的集体军事训练。“四时讲武，三年大习”^[1]，虽带有儒家对于古代社会的理想色彩，但毕竟透露了中国初民习武生活方式的消息。远古的学校，最初就是未成年人集中起来进行集体军事训练的场所。教学内容有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但内涵与后来儒家经典所描绘的不同。那个时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学校以军事训练(射、御)和祭祀礼仪(礼、乐)为主要教学内容，识字(书)和学算(数)只是一种基础知识。被称为“师氏”的任教老师是由军官担任的^[3]；古代教师的尊称——“夫子”，也源于“千夫长”、“百夫长”等军官的职称^[4]。这样，从成年人到未成年的少年儿童，几乎全民的主要社会生活都与习武有着密切的关系。

远古尚武的风气和习武的生活内容使得当时的人们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风俗习惯。那时，凡因怯阵战败而死的人，死后要“投诸茆外以罚之”^[5]，因为“无勇”是最被人所鄙视的品格，连死后都得不到宽恕。相反，在战场上英勇战死的壮士，其遗孤和双亲每逢春秋两季都要享受特殊的礼遇，收到特殊的慰问品^[6]。平时，败军之将和在战斗时畏葸不前的懦夫连演武都不准参加，这对于一个男子来说则是最大的耻辱^[7]。在祭祀的仪式上，人们常常挥动着彩绘，随着鼓点执持兵器手舞足蹈，通

[1] 《左传·隐公五年》。

[2] 《左传·成公十三年》。

[3] 《周礼·地官·师氏》。

[4] 参见杨宽《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7页。

[5] 《周礼·春官·冢人》。

[6] 《礼记·郊特牲》，《周礼·天官·外饔》。

[7] 《礼记·射义》。

过舞蹈再现战斗的场面，十分壮观。^[1]古时对男子的一些美称——如“贤良”、“俊士”，“桀俊”——都是跟“形貌壮大”的有勇力的武士有关^[2]，可见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

具有强悍民族性格的初民，在漫长的史前时代长期为浓重的习武风气所熏陶，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尚武传统。这股基于我们民族根性的尚武传统虽受到继起的夏商周三代的礼乐王官文化的冲击，但在先秦社会中始终有着巨大的影响。它的存在，为侠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2. 先秦好剑之风的兴起

与侠的萌芽有关的，除了全民尚武、习武的社会环境外，还有当时一种独特的社会心态，那便是弥漫于全社会的经久不衰的好剑之风。

远古时期，武器的设计和制造尚处于初始阶段，正如《淮南子·氾论》所述：“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脩戟无刺。”为利于在山地丛林中奔跃和近战，那时主要使用的是短兵器。在有限的几种短兵器中，剑轻便易使，直刺旁击都能运用自如，且构造简单，容易制造，所以为人们所普遍喜用。

夏商周三代以后，剑的实战作用逐渐被其他武器所代替，但它作为源自远古时期的尚武精神的象征物，却越来越被贵族和平民所共同爱好。春秋时期滕国的国君就毫不掩饰地说：“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3]另一个小国莒国的国君“虐而

[1] 《周礼·地官·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注》曰：“兵，谓干戚也。帔列五采绘为之，有秉，皆舞者所执。”

[2] 参见《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12页。

[3] 《孟子·滕文公上》。

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1]，好剑到了疯狂的地步。后来的赵惠文王也酷爱剑，在他的身边聚集起三千多名“剑士”。这些人都“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是些贫民，但他们和赵惠文王同样好剑，“日夜相击于前”。^[2]

在好剑之风的浸染下，社会上形成不少与剑有关的习俗。那时，佩剑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也是男子显示仪表和风度的服饰。《说苑·反质》描绘身处富贵乡的经侯“左带羽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真是不可一世。^[3]沦落在社会底层的诗人屈原不止一次地在诗中描绘了一位“带长剑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行吟泽畔、上下求索的爱国诗人形象，这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写照。^[4]《说苑·善说》述楚国的王族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玉、带玉璚剑，履缟舄，立于流水之上”。可见佩剑还是一种册封贵族仪式上的服饰。朋友间相互赠剑，在当时体现一种相当深厚的友情。吴国贤公子季札挂剑于知友徐国国君的墓旁，表示“吾心已许之”，一时传为美谈。^[5]

社会上的好剑之风，不但使一些善于铸剑的能工巧匠（例如吴国的干将和越国的欧冶子）以及某些著名的相剑者（例如越国的薛烛）应运而生^[6]，而且还造就了一批武艺高超的民间剑术师——即《论衡·别通》篇中特别提到的“剑伎一家”。

越女大概要算是历史上有较完整记载的最早一位民间剑客

[1]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2] 《庄子·说剑》。

[3] 玉具剑为春秋时期前后贵族们的奢华装饰。参见孙机《玉具剑与瑞式佩剑法》，载《考古》1985年第1期。

[4] 《楚辞·九章·涉江》。

[5] 《史记·吴太伯世家》。

[6] 关于干将、欧冶子和薛烛的记载，参见《越绝书》和《吴越春秋》。